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9年文学理论评论：在历史与当下之间

李音

文学“新时代”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文艺创作、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3月4日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艺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的讲话中的句子。这篇讲话,随后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为标题,发表在《求是》杂志上。“新时代”,在近年来中国文学理论评论领域始终是高频率出现的关键词。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新时代”这一概念提供了关于社会发展与文学内部历史的最新划分与定位方式,更是由于这一概念的背后,真切地存在着新的文学语境、新的文学格局、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文学课题、新的文学可能。它引导我们从崭新的视角和问题意识出发,去总结中国文学的来路、分析中国文学的现状、并展望中国文学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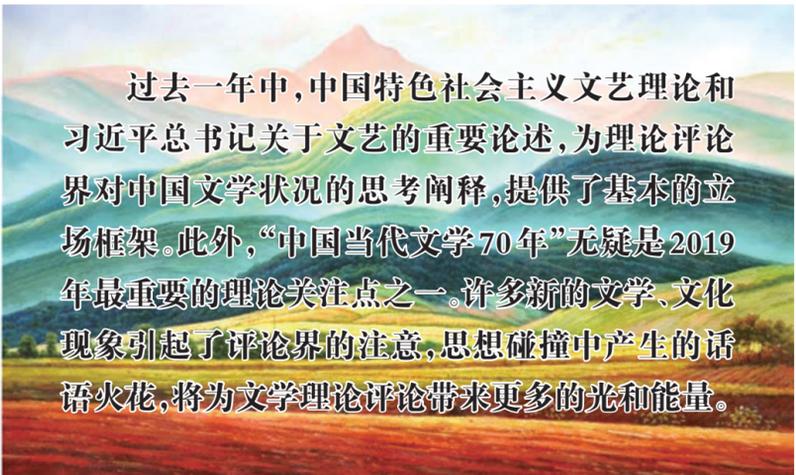
与此前一样,201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理论评论界对中国文学状况的思考阐释,提供了基本的立场框架。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一文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坚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为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在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高度评价和评价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事业的良好发展态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要贡献,并对中国文艺文学事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一大批向更深处挖掘、向更新处阐释的理论文章在过去一年中发表出来。铁凝在《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发表于《求是》2019年第1期)一文中,深入而全面地阐释了文学与“新时代”间的关系:“新时代,意味着改革的全面深化拓展,意味着经济社会领域里那些迷人的数字,意味着一个大国乘风破浪的豪迈姿态,更意味着一个民族光辉灿烂的前程。而作为新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我们更愿意去辨认人们的表情、神态、语言与行动,以及隐藏在其中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图景。”李敬泽在《新时代 新课题 新作为》(发表于《人民日报》2019年7月27日)中提出,“身处宏伟的社会历史中,这个时代的写作者需要一种与之匹配的认识能力、一种辩证的总体性视野,从纷繁万象中把握主流、趋向和结构,从个别、具体中洞察总体,也把个别和具体还给总体、还给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何向阳《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的问题导向》、马建辉《习近平文艺讲话的历史性理论贡献》等文章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相关问题。

《文学评论》在2019年第4期推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知识体系”专栏,《文艺争鸣》在2019年第6期推出了“理论批评的中国问题”研究专辑。此类努力鲜明地显示出理论评论界构建中国本土文艺理论话语的自觉意识,这也是近年来愈加明显、而在过去一年中得到持续深入推进的理论评论潮流趋势。谭好哲《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的三个追求》、刘跃进《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高建平《资源分层、内外循环、理论何为——中国文论70年三题》、张江等围绕“公共阐释论”相关理论问题展开的讨论,皆可放置在此话语框架下加以关注。

新中国文学70年与五四运动百年：成就经验与未来启迪

201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它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意味着新中国文学(即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70年的岁月。“中国当代文学70年”无疑是2019年最重要的理论关注点之一。

最直观的层面上,这种关注,聚焦于文学界一系列规格高、影响力大的文学动作和相关宣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发表讲话,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负责同志和作家艺术家代表发言。《文艺报》《人民文学》举行创刊70周年座谈会,“全国诗歌座谈会”将中国诗歌70年发展成就及经验启示作为重要讨论话题之一,各地各刊物纷纷围绕“70周年”展开一系列纪念和研讨活动。“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新中国70年文学丛书》等主题出版物的隆重推出,在“70年”的时间节点上,继续显示出中国文坛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过去一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的重要论述,为理论评论界对中国文学状况的思考阐释,提供了基本的立场框架。此外,“中国当代文学70年”无疑是2019年最重要的理论关注点之一。许多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思想碰撞中产生的话语火花,将为文学理论评论带来更多的光和能量。

与丰富的纪念、座谈、研讨等活动相呼应的,是大量回顾新中国70年文学成就、展望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文章。2019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钱小芊发表了《与时代共进步 与人民同呼吸——70年中国文学成就与经验》一文,对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之路与未来方向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分析。《文艺报》专门开辟了“新中国文学七十年足迹”等专栏,约请专家学者对70年来不同文体的文学创作成绩,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梳理盘点,并刊发了一系列从不同理论话题点出发、回顾总结70年中国文学发展成就的名家访谈文章。《人民日报》“逐梦70年”专栏和《光明日报》“新中国文学记忆”特刊,在角度选取方面各有侧重特色,投入了大量版面,产生了广泛影响。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70年发展历史,理论评论界在以下几个维度上,形成了基本的肯定性共识。一是70年来中国当代文学思潮迭兴,贡献出一大批文学精品力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建立了优良传统,这也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之路在今天可以顺利推进。二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历史之间一直保持着同频共振,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图谱与社会生活图景,都在文学作品中获得了很好的书写记录,作家的笔触为70年来各个历史时段留下极富代表性的时代形象与精神剪影。三是中国当代文学建立了关注现实生活、刻画普通人形象的传统,换言之,新中国文学70年来始终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四是中国文学经过70年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传播越来越广,一方面获得了一代代读者的喜爱,深刻地参与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与精神建构,起到了引领风尚、培根铸魂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在国际传播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成就,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正变得越来越大。

2019年,还是五四运动百年纪念的年份。《文艺争鸣》杂志推出了“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专辑”,《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也推出了“五四新文学百年研究专辑”。陈思和、丁帆、孙郁、李春青等诸多学者,从思想资源、话语方式、身份构建等不同角度,梳理探讨了“五四精神”及五四运动同中国新文学的关系等理论话题。这类以年份为契机展开的理论研究,当然不仅仅是“纪念”甚至“纪年”这么简单,而是充满了当下语境的呼应对话可能。正如丁帆在《追问“五四精神”》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个可以不断深入阐释的论题,无论从哲学的层面还是历史的层面来加以解读,我们对照现实世界,总有其现代性意义。”

光和能量：热点理论话题与问题意识

过去“是怎样”,紧紧联系着今天与今后的“应如何”。一切有效的思索,最终都会落脚于对当下重大命题的反思、思索。2019年,许多被重点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其实都可以从新中国文学70年乃至五四运动百年的历史谱系中展开思考、牵起话头。例如现实主义话题。在过去的70年中,乃至自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现实主义就一直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主流。这种主流在今天应当如何继续坚持秉承,该如何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发展出新的形态?当现实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剧烈变化着,文学怎样才能够重建理解现实的总体性视野,更好地捕捉和表现这种现实,如何重新强化文学与现实的对话能力乃至对现实的影响力?这些显然是意义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是缠绕着当下文学创作的急迫焦虑。围绕现实主义,《文艺报》开设了“理想性与现实主义文学的可能性”系列访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贺绍俊《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李松睿《吞噬一切的怪兽或劳动者——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一》(文章发表于已经面世的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是其即将展开的“漫谈现实主义文学”专栏第一篇)等都从各自角度谈出了现实主义这一经典话题的“新意”和“当下意义”。

城市与乡土,是2019年文学理论评论界一

组颇具“对举”意味的“热词”。关于“城市文学”的讨论在2019年继续升温,《青年文学》杂志的“城市文学排行榜”影响力持续扩大,并举办了首届城市文学论坛。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使城市经验成为了新的分量极重的文学生长点;城市经验的变化导致认知发生改变,必然给写作带来新的变化,也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与此对应,乡村经验的形象与结构,也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改变,加之“脱贫攻坚”成为社会历史层面的重大话题,中国文学的乡村书写问题同样在过去一年获得了集中讨论。南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一文中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将这种梳理落脚于当下视角:“乡村的惶惑、重新集结以及农耕文化与现代性的交接将构成当代文学史乡村谱系的未来一章。”中国作协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将“历史视野下的脱贫攻坚与新农村书写”作为三大议题之一(另两项议题是“新人、新主题与现实题材创作”和“从小说到影视:文学如何介入大众视野”),如何突破固化的乡村书写模式、作家在面对农村文明的深刻变革时怎样呈现出新的活力,成为了与会作家评论家热议的话题,一系列相关文章成果已在各大报刊发表出来。

过去一年中,许多新的文学文化现象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张柠《世界的轻重缓急及其想象方式——三次元与二次元对话的可能性》一文,从历史叙事、人文传统、对世界的认知方式等角度,对“二次元文化”进行了全新的解析,从更高的视角去思考和理解当下青年群体“反对‘重’而主张‘轻’的新追求”。许多青年评论家则对电子游戏、网络短视频等时代文化生活的热点新形式,展开了文学文化角度的解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I”(人工智能)、“AI写作”事件在文学界引发了一系列讨论,杨庆祥发表于《南方文坛》的《与AI的角力——一份诗作和思想实验的提纲》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本:事实上,科技进步只是话题的引子,“自我复制、自动化和程序化”导致的“严重的诗歌泡沫”、“诗歌和诗人之间产生一种脱落……技巧和习得成为一种普通的认知结构”等具有普遍性色彩的文学危机,以及“重新在诗歌和‘人’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之类的呼吁,才是“AI”话题之所以“热”的热源所在。

关于“二次元”和“AI”等的讨论中,显示出文学对自身传统及现状的重新思考与反思。2019年更大的一场自我思考,则围绕“青年写作”话题展开。《中华文学选刊》推出了规模浩大的“当代青年作家问卷调查”活动,继而又组织青年评论家撰写推出了“青年作家问卷调查报告”。当然可以将此理解为是对青年作家队伍的“常规性检阅”,但类似“调查”和“笔谈”的更大意义,其实在于组织起了对青年作家的创作现状、群体状态乃至潜在问题的集中思考讨论。类似的话题,在复旦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上同样被提出过,我们从中能听到一些更加直白刺耳、但的确充满现实针对性的讨论声音,例如关于“青年崇拜”背后的“年龄焦虑”现象、对文学新人的过度助长收割问题、甚至“媚少”心态等。

从这些细部,我们不难辨认出已被文学界呼唤许久的“锐评”“锐见”的影子。有鉴于此,我想还有一篇文章值得提一提,那就是张定浩与黄平发表在《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的、充满“抬杠”精神的《“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有趣的是,《文艺报》微信公号在编发此文时,正是使用了一人“抬”一人“杠”的排版创意。这篇由特定争议观点衍生出的对谈,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判断分歧出发,逐渐拓展至陌生经验、底层生活、文学价值等诸多重要话题,其中不乏步步紧逼、见招拆招的辩论元素。这样的观点交锋令我们感到,那种敢于亮观点、说真话、讲道理的文学批评,的确正在回到我们身边。这无疑是大可期待的事情,因为恰如黄平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分歧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动力”;那种由分歧而来的、自理性讨论与思想碰撞中产生的话语火花,将为文学理论评论带来更多的光和能量。

2019年柳青的《创业史》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这也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基于不同的文学审美理念和偏好,《创业史》不一定在每个人心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今天书写乡村的作家也极少追随柳青的写作,对其褒贬不一是文学阅读公开的事实。作品流传自有命运,在声誉评价之外,有时候作品和读者之间发生的际遇出乎意料,甚至令人啼笑皆非。成长于上个世纪的文学爱好者、研究者可能很难想象到,像《创业史》这样的作品,隔开一点历史时空以后,在今天最年轻的读者(世纪之交出生)手中,在大学的文学课堂,逐渐开始散发陌生的、奇异的光芒。一位清华中文系的本科生告诉他的老师,《创业史》似乎治愈了他的抑郁,读完这部作品,身为“老一代”的他感觉人生还是有意义的,广阔天地有待作为。或许这才是经典的意义,超越喜爱与否。卡尔维诺说过,经典作品总能抖落历史的烟尘,在不同时代发出或强或弱频率不同的声音。当然,这样“神奇”的阅读遭遇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意义。相反,这恰恰反衬出我们的时代和言语严重缺乏着某种东西、某类经验表达——也许是旧事物,但旧事物也会因为疏远稀缺而重新变得新奇。

今天当然不能从《创业史》中再获取对时代及乡村的认知,但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遗忘曾经存在过的世界,彻底轻视那种对世界的理解和叙述方式。对大学课堂上那位青年人而言,个体生命如此有力地承担历史,无数人汇合起来改变天地的力量,可以想象那是一种崭新的体验。其实,即便是阅历较丰、更成熟的文学阅读者,不管是否经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只要读过《创业史》,为了省下两角钱在渭河边的车站睡觉,去太白山山下买稻种的梁生宝的形象仍然会越出纸面立在人的面前。我们没有亲历过梁生宝的世界,但他对于五分钱、一角钱的精打细算,对于换了稻种以后一亩地变成两亩地,全黄堡区五千亩稻地增产一百万斤这份清清楚楚的账单和梦想,却帮助我们真实可感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肌体,瞥见和度量被组织进现代工业化时间体系中农民思想情感和农村风貌的巨变。春雨刚刚地下着。秦岭西部太白山的远峰、松坡,渭河上游的平原,竹林、乡村和市镇,百里烟波,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春雨中。“他想:在这里美美睡上一夜,明日一早过渭河,到太白山下的产稻区买稻种呀!但是,也许是过分的兴奋,也许是异乡的情调,这个远离家乡的庄稼人,睡不着觉。票房的玻璃窗外头,是风声,是雨声,是渭河的流水声……”风声、雨声、渭河的流水声,是好风景,但梁生宝这个新时代年轻的庄稼汉对风景的欣赏和占有,建立在对世界的务实把握和精确规划上。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易时移,乡村和风景早已今非昔比。在大数据时代,不仅一切事物都被数码化可视,一切事物也被表述为各种统计和数字。数据无处不在,乡村也不例外。来自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国家发展规划各项指标乃至“精准扶贫”,都在尽可能标注每一寸土地,继而持续铺展着行动。然而,奇诡的是,“账单”或者说某种算账的能力,却在我们的文学书写尤其是乡村书写中消失了。当下大量以乡村为主题或背景的文学生作品,让人强烈感受到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绵延,古老的或消失的乡村的魅力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仍然诱人,作家仍然喜欢把它作为城市或资本无孔不入的当下世界的参照物。无论是感伤的挽歌还是愤怒的批判,这些作品大致仍延用着或隐或显的现代/传统、新/旧、城市/乡村的对立结构,分配着传奇与庸常、生机与毁灭、健康与堕落、亮丽与晦暗的修辞。必须尊重和理解作家、诗人的这种文学想象,尤其是那些杰出的创作,他们“把那些过去的好日子当作一种手杖,来敲打现在”,为我们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保留着精神田园。但从文学创作的总体格局来看,对乡村抒情也好,痛诉乡村的苦难也罢,表达大同小异,语法重复,充满了对乡村的成见,对其过去和当下下一厢情愿的想象。我们对大地上发生的巨变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因为固化的乡村书写模式和语法无力表述,遮蔽了真实。当下的乡村已经卷入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经历着复杂的社会结构性变迁,任何一个村落现在都无法独立封闭地看待,都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着或隐或显的联系,其苦难和活力都需要放在这种结构性巨变中来重新审视、辨认及表述。然而我们所习惯的乡土抒情无法捕捉“运动”中的乡村——小到一家庭大至一个地区,其社会组织模式,生产方式、经济网络以及情感观念变迁中的乡村。这种文学书写的固化滞后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们对“账单”的忽视和无力造成的。账单是我们基础而坚硬的生活问题,是政治经济常识,在隐喻和文本书写的意义上,它是构造和绘制大地的沟壑、肌理的事物。在做各种各样的文化理想主义者之前,我们都应该补上经济、算账这一门硬课,尤其是在今天。

今天的乡村,或者应该说整个世界的经济运转的复杂以及虚拟化程度,大大超出我们直觉判断能力范围,亦非一目了然可以理解。因此,要想理解今天的乡村,决不能指望列一份传统的小农经济账即可,而是需要文学家有意识地补充经济学知识,锻炼社会学的想象力、人类学的观察力,运用各种信息,尽可能清晰地绘制出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今天的乡村是一部虚实相交、高下不等、盘根错节的经济大账,既有传统的农业生产,非常具体的一家一户脱贫的经济问题,也有像“拼多多”这样的由互联网经济带动乡镇活力造就的商业奇迹,还有各种出其不意的自媒体流量经济,如今还能想象为新乡村生活代言的“李子柒”,其风靡海内外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传播能量?今日乡村在世界经济文化结构性变化中的命运,其爆发出的新的历史活力,面临的新困境,都是我们从未描述过的、有待理解的经验。这需要作家有总体性视野,有捕捉历史动力透视社会运转的能力,又能具体而微地深入到乡村日常生活和生命个体。我们应该重新珍视《创业史》这类作品的写作道路及其建构世界的方式,进行类似于梁生宝成长为新人所经历的思考和锻炼,但绝不是再塑造一个梁生宝能解决的问题。今日乡村的现实及其和世界复杂的关系需要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焦距、不同的叙述来看,来思考,来命名。

据说李子柒所属的微念科技公司辟谣否认其年收入1.68亿人民币,但是对于超过4000万粉丝,“已经形成了一套从收入、依靠内容和全网流量采买分发的能力,低成本、快速地将培养巨型红人的体系”大IP来说,收入之不非是可以想象的。“从大城市回归美丽的乡间,穿着汉服拍摄自己手工做食物的高颜值短视频博主”,李子柒的人设看上去平淡无奇,却引爆了时代。豆瓣上的文章《李子柒走红背后,是中国年轻人“城市梦”的破灭》分析得十分透彻。2019年开始爆出的热词“逃离北上广”,宣告了城市生活诗意的破产,持续上涨的房价、长时感集的通勤和清理流动人口,碾压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只要人们还因为城市里的肉搏生活而感到痛苦,李子柒的田园诗意就可以作为城市生活的反面,无限地拍下去。不过,上山爬树、吹柴捕鱼,绣出蜀地山河,围炉载歌载舞这些田园风诗意背后仍旧是资本的注入,目前中国MCN(Multi-Channel Network,即有能力和资源帮助内容生产者进行持续产出和推广变现的公司)行业的整体规模、业态及呈现形式等早已远超海外,整体市场规模已达百亿级。将来会有更多的“李子柒”或类似的流量经济出现。文化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趋势,是理解李子柒这样的乡村新主体的核心之一。同时,资本的选择选择又是无比理性和挑剔的。李子柒团队的新乡村生活视频并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传统呈现,而是不断改进的精心叙事,如豆瓣上那篇犀利通透的文章所归纳的,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审美的集大成者:她的花草美图写实是小清新镜头,她切菜的案板类似于城市的茶道置景架,她一身国服装在林中纵马荷塘逡巡,本是仙侠剧的场景;她2019年的视频,每一张定格都是静态大片,光线审美已经向维米尔的油画靠拢……同时也不能忽视,李子柒干活麻利,善于通过网络吸收知识和技能,充满创造力和生机,她展现了典型的“90后”形象。李子柒视频拍摄的进化史,也是乡村青年的进化史,田园叙事的进化史。文学家可能(也应该)看不上这种风格混搭拼贴,但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她先文学一步更新了乡村叙事。

李子柒如今几近于温和平静,散发了天地大美,但我们不应该忘了她的前史——本名为李佳的佳佳的故事。她14岁迫于生计到城市打工,漂泊8年,在公园的椅子上睡过,啃过两个月的馒头,当服务员的时候,一个月300元工资。因生活变故返回农村,最初的想法也很简单——回家种地。这个故事一点也不诗意,充满艰辛。但这个故事很特殊,“李子柒”是稀缺的,很多人永远只能是“李李佳”。但在“李子柒”和“李李佳”并存、且有可能千百回产生联系的时代,怎么讲述无数个李佳佳的故事?在我们的时代,奇迹也是需要得到新的审视和表述。米歇尔·法柏有一个短篇小说《明细》,是有关一名不幸地生活在澳大利亚农场的13岁小姑娘的故事。这篇小说的名字也被翻译为《账单》,作家在小说中不断地详细列出小姑娘玛戈的日常开支。她的生活遭遇很不幸,几乎凑齐了最糟糕残忍的不良家庭元素,由于靠政府福利支撑生活,玛戈必须时时刻刻化为本能地盘算日常生活的每一项开支。但小说名为《明细》最重要的原因是玛戈为了避免死亡计划逃离家庭,她为出逃行程详细制定了一个费用明细。该明细总额最高需要2400澳元,最低需要2376澳元。那么钱从哪里来筹备呢?她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宇航局NASA因为太空厕所设计花费巨额而遭批评,于是玛戈穷尽她从《怎样及为什么知识小百科》中自学到的知识,自以为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能节省几百万的解决方案。她写信给NASA,并诚恳地附上了她的费用明细,小心翼翼开价2376澳元(1661.92美元)——避免因表现得太过贪婪而触犯天命。米歇尔·法柏的小说没有结尾,他只附上了玛戈所看到的那则新闻:“新式太空厕所造价高达2300万美元,NASA官员遭受猛烈批评”。奇迹当然不会降临在悲惨的玛戈身上,一如苦难亘古长存。但法柏改变了我们衡量苦难的尺度,唤醒我们麻木的感受力,他在最卑微的蝼蚁般的个体生命和最宏伟壮丽的人类宇宙梦想——如此遥远的物种之间奇迹般建立了联系,同时“明细”也照出了我们时代的辉煌和暗淡。从此,宇宙之大只为了回馈玛戈的苦难,再伟大的事业也需要处理人类排泄问题。一张清晰的账单,就这样改变了世界观——终究有一天,会从文学抵达现实。

布罗茨基说,每一天,人们的心理都会发生很多变化,但人们的表达方式却往往一如既往。表达能力落后于体验,这对心理会有不好的影响。那些无名无姓的感情、感受、思想和印象没有被表达出来,没有获得大致满足,它们在某个个体的内部不断被压抑,最终会导致心理爆炸或心理崩溃。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如果语言不能更新,充满无可名状的活力和问题的乡村就会成为我们不可理解的怪诞之物,对它不能准确描述是文学的失败和失职。我们对乡村那些陈旧失效的表达和语法亟需更新和校正,很不文学的“算账”能力也许会对它大有裨益——最低发挥社会学功能,最高则有望创造新的美学。时代来到我们中间寻找骑手。这个骑手,我认为,他需要有很多特长,但能读懂我们时代的账单,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项能力。